

潘蛟在职博士候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副教授):

开发西部不是单纯的扶贫、受援,而是共同发展,到西部找市场的问题

西部开发的问题,其实已是一个老话题,只是提法不同。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50年代支边、60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些都是西部开发。七八十年代胡耀邦也有个西部开发,今天等于是重提西部开发,与以前提的有哪些不同?有些含义必须来挖掘一下,开发西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西部人民的生活质量,它是与东部人民的生活质量连在一起的。西部人要生存,现在呼喊的是返林还草,西部上游为了生存而砍树,破坏了生态,下游则闹水灾,从这样的问题看来,下游要生活需要上游保持生态,这当中,不止是一个资源的问题,不是支持、帮助、可怜、从苦海里拉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互相的问题。另外的一种含义是东部的经济发展需要拉动内需,要修路,西部也是东部的投资市场,西部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扶贫、受援助问题,而是共同发展,到西部找市场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共同富裕,大家都要富裕的话,需要西部发展,我们要揭示出西部的贫困。实际上贫困与发展、不发达是一种关系问题,并不是个人素质问题。

开发涉及到关系的调整,谁来开发西部,给西部画蓝图。有人提到用教育来拉动经济,以人才来开发经济,西部没有人才吗?问题是西部人才往东部流,西部光有人才不行,还得有国家的投资。国家的调控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胡鞍钢提出教育优先开放,到目前为止,教育还没有对外开放。可能西部在这个方面能走在前面,可能还不能同时走。

钱民辉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西部人才开发的高起点与西部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的关系

以科技为先导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无疑将人才引进与培养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这样必然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同时也为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西部地区是我国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之间较为封闭性的特点,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由于长年教育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等问题突出,严重地影响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从目前来看,西部开发战略将人才开发起点提得很高,特别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实现科教兴西的战略。但是,从长远来看,西部人才开发的源泉是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质量,进而会影响到西部地区开发战略的有效实现。

从西部人才战略构想来看,应当说明的是,人才引进与人才开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才引进具有短效性,是一种“治标”行为;人才开发具有长效性,是一种“治本”行为。从外面引进人才和内部开发人才相结合才是“治标治本”的合理策略。从近期的口号看,西部开发明确地提出了重点开发西部高科技人才战略构想,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学进行扩招,实现西部人才的规模开发与利用。这种人才开发的高起点是适应高科技龙头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点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在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短期内不可能很快提高的情况下,而高等教育则迅速起飞,长期下去势必影响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质量。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科技人才也并非都是高等教育的产物,中等教育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同

样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东部各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发展应是中等教育普及的结果,客观地说,我们相信高等教育的普及必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但是至少在目前还没有找到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那么,既然如此,当前西部人才开发的起点应当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我认为,应当注重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尽快提高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质量,大力发展面向科技产业的,既有民族特点又能适应西部经济开发需要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有计划地发展高等教育。将人才开发的目光从精英投向大众,从依靠引进到依靠开发,从短期放到长远,只有这样,西部的人才开发才能为西部地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胡鸿保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应该思考西部开发与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战略

谈到“西部开发与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战略”这个主题,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是,不要把此情景中的概念简单地局限在“教育部”的“教育”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教育”在这里是一个文化濡化和文化传承的问题,应该从人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角度去思考,而决不是学校教育或者制度化教育所能涵盖的。对于我们的主题而言,研究“九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等的改进,虽然不是没有意义,可是可以调节、能发挥作用的回旋余地比较小。另外,“民族”在这里则是“国民”,而不是某个单一民族——不论是少数民族或主体民族。尽管需要考虑少数民族和多元文化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并不是个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民族之间的共同性(比如“城市化”、“贫困”)远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差异性。

而且我们知道,“文化”也和“民族”一样,是一个概念。我以为具体在我们的研究中,与其说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如从一个整体文化内部的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思路入手来得更加有利。要考虑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相互关系,充分认识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郑杭生教授曾经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提出过一种“文化模式”,他表述为:“主文化一元主导,旗帜鲜明;亚文化从属多样,各显神通;反文化分散受限,难以泛滥”。这是文化地位一致的情况。与之相反,则是“文化地位相悖”,这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是不利的。(详见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的几个问题》,载王筑生主编《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我认为今天会议讨论的议题,应该着手去解决的是一种主文化过分强化而导致的“文化地位相悖”。

应该通过学者的努力让有关主管部门和官员认识到“放权”的必要性,凡事需要灵活、不要强求一致(如西部与东部的一致)。而这种灵活是从亚文化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出自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或者主流文化中心主义的考虑,这种思路避开了所谓的“民族问题”的边缘性和敏感性,民族圈外人士可能更容易理解。

我还想强调这么几点:学校以外的教育(“扫盲”除外)更应该引起重视。在任何时候,成年人的再教育要比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更大。要充分运用现代传媒(电视、广播、电影)的文化模塑作用。因为即使是识字的老百姓现在也是看电视电影比读纯文字的宣传品多,更何况中国历来的文化传播多半是依靠“戏文”这类媒体的。有必要把民间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那种把某些大众文化一概斥为封建迷信落后的观点是不对的。